

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對新婚夫妻自我概念的影響：行動者—伴侶相依模式之探討*

吳志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張思嘉**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討婚姻初期自身及伴侶對關係的正向與負向整體評估對形塑華人夫妻的婚姻我（婚姻關係中與配偶相互尊重並維護和諧互動的關係自我概念）與家族我（家人團體中達成家人共識與團結並實現家族目標的團體自我概念）的影響。**研究方法：**兩波間隔兩年的追蹤調查共蒐集到93對夫妻的有效資料，第一波施測時平均婚齡為1.30年（標準差0.68年），丈夫與妻子的平均年齡分別為31.46歲（標準差3.51歲）與29.89歲（標準差2.84歲）。**研究結果：**分別針對正向婚姻品質（模型一）與負向婚姻品質（模型二）進行行動者—伴侶相依模式分析，皆獲得可接受的整體適配度。模型一結果指出，夫妻雙方的正向婚姻品質對自身婚姻我與家族我皆具正向顯著的行動者效果，妻子的正向婚姻品質對丈夫婚姻我具正向顯著的伴侶效果，其餘效果未達顯著水準。模型二結果發現，妻子負向婚姻品質對自身婚姻我與家族我具負向顯著的行動者效果，並對丈夫婚姻我與家族我也具有負向顯著的伴侶效果，其餘效果未達顯著水準。**研究結論：**婚姻生活中的正、負向婚姻品質在婚姻初期有著形塑、再構婚姻我與家族我的作用，且在夫妻間有著不同影響。最後探討抽樣偏誤、缺乏細緻運作機制等相關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並期望各項發現可供實務應用，增進理解婚姻生活經驗形塑華人多元自我概念的運作機制。

關鍵詞：正向婚姻品質、行動者—伴侶相依模式、負向婚姻品質、家族我、婚姻我。

* 本論文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建議；研究經費獲科技部（原國科會）研究專題計畫經費補助，特此一併致謝。計畫編號：NSC 96-2413-H-128-002-MY3。

** 通訊作者：張思嘉，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email: scchang@mail.shu.edu.tw。

DOI: 10.53106/172851862022050064003

壹、緒論

婚姻是人生重要的階段，擁有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更是多數人的浪漫期望，然而婚姻同時也帶來許多變化與挑戰（Baxter et al., 2008; Neff & Broady, 2011），需要伴侶雙方用心經營與調適。其中一項變化，是個體將開始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自我（self）。相較於婚前的孑然一人，婚後個體開始會透過配偶、女婿或媳婦，以及大嫂、姊夫、弟妹、妹婿等姻親關係的新身份重新看待自我。婚姻關係雖然賦予了個體這些新的社會角色，但是並不代表個體就能充分認同這些新的角色身分，將其內化、整合成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

根據社會認知取向的性格學者們的主張（e.g., Bandura, 1986; Mischel & Shoda, 1995），個體的內在性格系統會受到生活經驗的形塑；換言之，個體在婚後能否內化、認同這些新的自我概念應會受到其婚姻生活經驗的影響。然而，探討婚姻生活經驗如何影響個體自我概念的相關研究卻不常見，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是透過追蹤新婚夫妻的對偶資料，檢證婚姻生活經驗對伴侶彼此自我概念的影響。此外，參考相關研究的發現，生活中的正、負向經驗對個體自我概念有著各自的運作機制（e.g., 黃博聖等人，2017；Sedikides & Green, 2000），而婚姻生活總不會是只有幸福美滿的正向經驗，無可避免地會有些挫折與失落的負向經驗，但是過往多數研究僅是以婚姻滿意度作為個體對婚姻生活的正向評估指標（e.g., Norton, 1983; Schumm et al., 1983），卻少有研究試著探討個體對婚姻關係或伴侶的期待感到失望、不滿意的負向評估指標及其影響。因此，本研究嘗試分別探討表徵婚姻關係中正向與負向整體經驗感受的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會如何形塑個體在婚姻初期的自我概念。最後，基於伴侶間的相依（interdependence）特質，本研究也將以近年來廣受對偶研究採用的行動者—伴侶相依模式（Kenny & Ledermann, 2010），深入探討伴侶雙方之婚姻生活經驗對於自身及伴侶自我概念的行動者效果與伴侶效果。

一、婚後的多元自我概念：婚姻我與家族我

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個體對自我所抱持各種內在性格成分的組合（Baumeister, 1999; Fiske & Taylor, 1991）。自我概念具有組織性，包含了個體對於個人特質、人際關係，以及多元社會角色的看法（Brewer & Chen, 2007; Kashima & Hardie, 2000）。楊國樞（2004）依據社會取向觀點提出華人的自我四元論，強調華人的自我概念除了關注個人的內在特質（需求、動機、信念、標準、能力……等）、

獨立性，以及個體利益的個人取向自我概念之外，還至少包含三種社會取向的自我概念：（1）關係取向的自我概念（關係我）是個體與他人互動時的自我概念，維繫關係的連結與和諧並且善盡關係角色的職責義務是當個體依循關係我行動時會朝向的適應目標；（2）團體取向的自我概念（團體我）是個體因應所屬團體特性與運作需求而生的自我概念，依循團體我行動時的適應目標是提升個體身為團體一分子的歸屬感，並促進團體的福祉；以及（3）他人取向的自我概念（他人我）則是個體認知體會自己身為公眾社會一份子的自我概念，與社會中許多非特定他人共存所需追求的適應目標，是在乎自己在公眾社會中的聲望、名譽，以及自身對社會的貢獻。

在這三種社會取向的自我概念中，關係我及團體我又會依據不同的對偶互動關係與不同的所屬團體，可以更細緻地區分成多種次級自我概念（楊國樞，2004）。舉例來說，在個體自我概念的系統中，可以同時存在著個體對應於婚姻伴侶、親子代間、手足，以及職場人際等關係角色所衍生的不同關係我，像是作為兒子、丈夫、女婿、父親等關係角色所對應的關係我就會有所差異，而這些不同內涵的關係我雖然都依循著朝向維繫關係和諧與連結、善盡關係角色義務的適應目標，但是在具體的行為表現上會隨著不同的關係而有差異。相同地，自我概念的系統中也可以同時存在著個體因歸屬於家族、社區、公司，或各類社團等不同團體而發展出多元的團體我，而這些團體我的適應目標雖然也都聚焦在提升團體歸屬感、促進團體福祉，但同樣會基於各自內涵的差異而有著不同的具體行動表現。

關係我與團體我的這項特性，也突顯出個體在心理社會發展各個階段適應目標的差異，即是個體會隨著生命階段的推進更迭而衍生出新的自我概念，藉以契合新的發展階段的適應任務。雖然不是必然，但是婚姻確實對大多數的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人生階段，當兩個原本獨立的個體締結婚姻關係後，在彼此的自我概念系統中便會發展出對應婚姻伴侶身分的關係我，以及因應婚姻締結而導致家族團體單位擴張所衍生出的團體我，而本研究將這兩種次級自我概念稱作「婚姻我」與「家族我」。並且參考楊國樞等人（2010）以及翁嘉英等人（2008）針對華人自我概念與多項心理特徵、自我價值的討論，我們具體界定「婚姻我」在本研究中指的是透過婚姻關係的建立，個體會更加確認自己與伴侶成為彼此的重要關係他人，把「伴侶」的身分認同納入自我的概念，並且在行為表現上做到彼此相依扶持、甘苦與共，維繫彼此關係的親密連結。至於家族我的自我概念，我們認為個體雖然在進入婚姻關係之前就已隸屬於自己的原生家庭，而家族我的自我概念原本就存在於個體的內在系統，但是如同人們常說「婚姻是兩個家庭的結合」，家族這個團體的界線範圍也會因為婚姻關係的締結而擴

張展開，因此在本研究中「家族我」指的是個體透過婚姻關係開始與彼此的家庭建立起親屬關係，成為彼此家族成員中的一份子（像是女婿、媳婦等身分），家族這個團體包含了自己的原生家庭與伴侶的家庭，必須要將整個家族的團體福祉考量帶進自我的內在系統，對於這個經過擴張展開的家族團體產生歸屬感，並以團體成員的自我概念實現整個家族的團結。

在既有的婚姻研究中可以廣泛地看見與婚姻我、家族我相關的概念。像是高旭繁與陸洛（2006）以「夫妻間的溝通與情感表達」以及「孝親奉養長輩態度」作為婚姻品質的指標，探討夫妻之間現代性與傳統性價值觀契合度對婚姻調適的影響，而這兩項指標正分別可以對應於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調適表現。陳靜宜（2006）以夫妻間的適應需求與困難，以及與家庭成員間的適應需求與困難，探究個人成長背景與婚前的親密關係是否會對新婚階段的調適表現造成不同的影響。張思嘉（2009）探討婚前認識方式與互動歷程對於婚姻滿意度的影響，同樣是以夫妻間以及與家庭成員間的適應需求與困難作為婚後互動調適歷程的重要指標。

也有學者直接援引楊國樞（2004）的華人多元自我取向的觀點，探討婚姻關係中婚姻我、家族我等取向的自我概念對華人夫妻在婚後婚姻品質的影響。像是Chang等人（2011）以新婚夫妻作為參與者，各自探討丈夫與妻子的多元自我概念透過不同類型的婚姻調適困難，進而影響彼此主觀知覺到的婚姻滿意度。范嵐欣（2009）邀請新婚夫妻參與夫妻衝突協調的工作坊，結果發現個體內部與彼此之間包含婚姻我與家族我等多元自我概念的衝突能否獲得協調，將會影響新婚夫妻對於未來婚姻關係發展的期待。而陳謙仁與葉光輝（2019）也在家暴毆妻男性的個案介入研究中，藉由化解個案內在婚姻我、家族我，以及其他多元自我之間的失衡，幫助個案調整內在的多元自我，最終有效地促進個案的婚姻衝突轉為和諧。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以發現，部分的既有研究是以婚姻我、家族我的相關概念作為華人伴侶婚後調適的重要指標（例如：高旭繁、陸洛，2006；陳靜宜，2006；張思嘉，2009），而另一部分的既有研究則是將個體內化認同婚姻我與家族我等自我概念的程度視為決定華人婚姻品質的影響因素（e.g., Chang et al., 2011），並採此一觀點應用在維繫、促進婚姻關係的實務應用（例如：范嵐欣，2009；陳謙仁、葉光輝，2019）。然而，目前較少有研究反向改以婚姻互動品質作為前置因素，探討個體對於婚後生活的主觀心理感受，將會如何影響個體對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認同程度。本研究基於以下兩個理由主張探討這項運作機制在學術與實務領域皆有其重要性與應用價值。

首先，既然過往的研究皆已經指出婚姻我與家族我這兩種自我概念對個體婚後生活調適有著重要的影響（e.g., 范嵐欣，2009；陳謙仁、葉光輝，2019；Chang et al., 2011），那麼探討有哪些因素能夠影響華人個體對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認同程度，相信對於助人工作或家庭生活教育的實務應用將能有所啟迪。而參考強調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取向之性格心理學家Albert Bandura與Walter Mischel的主張，個體的內在性格系統與外在環境經驗是雙向交互決定（reciprocal determinism）的因果關係（Bandura, 1986; Mischel & Shoda, 1995），自我概念作為內在性格系統重要的運作單位，其運作不僅是會影響個體不同的生活經驗，也會同步受到生活中不同經驗的形塑與再構（reconstruct）。換言之，華人在婚後對於婚姻生活感到滿意與否的經驗感受不僅會受到婚姻我與家族我的影響，也有可能反過來增強或弱化婚後華人對於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認同程度。

其次，家庭系統理論（family systems theory）（Broderick, 1990; Broderick & Smith, 1979）指出家庭是有許多次系統所組成的有機體，這些次系統包含了婚姻次系統、親子次系統、代間次系統，以及手足次系統等，分別對應於不同家庭成員間的對偶關係。對婚姻關係中的個體來說，多樣的家族角色背後各自有其對應的家庭次系統，而這些次系統並不獨立存在，看待個體的家庭生活適應不能只看他／她所擁有的某一種家庭角色身分，而是應該要看見這些多樣且不同的家庭角色如何產生連結並發揮交互影響的作用（Erel & Burman, 1995; Krishnakumar & Buehler, 2000）。也就是說，這些次系統之間可以彼此滲透的，而這種不同次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的現象即被稱為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e.g., Cox et al., 2001; Pedro et al., 2012）。就如同前述，本研究認為新婚階段不只是個體發展出婚姻我的關鍵階段，同時也是家族我擴張涵蓋婚姻親屬家庭成員的過渡階段，因此婚姻生活經驗不僅會作用於個體的婚姻我，同時也會形塑個體的家族我，即是呼應了家庭系統理論中的外溢效果，說明婚姻次系統中伴侶雙方的互動品質有可能會滲透、作用於其他的家庭次系統。

二、婚姻關係的整體評估：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

對已婚者來說，婚姻關係的品質對整體生活的適應表現，像是生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或是身心健康等，都有著舉足輕重的重要影響（Carr & Springer, 2010; Robles et al., 2014; Shek, 1995）。只是回顧既有的文獻可以發現，婚姻品質是個複雜、具有多樣面貌的概念。有些學者傾向以客觀的婚齡作為婚姻中穩定度（marital stability）的指標，強調的是婚姻關係能否持續地長久維繫（e.g., Yu, 2015），但婚齡畢竟只是

時序數字的累積，從單純的婚齡較難以窺見個體在婚姻生活中的互動表現與經驗感受。有另一些學者關注在婚姻的調適（adjustment），強調婚姻是一連串動態調適（或壓力管理）的歷程（e.g., Marchand, 2004），需要透過伴侶在婚姻關係中的互動模式（例如情感溝通、能否形成共識、如何因應婚姻中的各類衝突等）來具體描述伴侶的婚姻生活。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則聚焦婚姻的整體評估（或滿意度），主張應以個體對婚姻關係所做出的整體評估反映婚姻生活。相對於測量伴侶間的互動模式，持這項觀點的學者傾向直接測量個體對於婚姻互動關係或伴侶經驗到的主觀認知與情緒感受，強調婚姻品質是個人對婚姻關係的期待與需求能否獲得滿足，並且對此感到滿意、幸福，或是喜悅的程度（e.g., Fincham et al., 2011）。

伊慶春與熊瑞梅（1994）表示，雖然婚姻的調適與整體評估這兩種取向經常被學者用來界定婚姻生活品質，但從上述介紹可知，兩者所關注的內涵有著相當大的區隔。婚姻調適著重在伴侶雙方的具體互動表現，往往會被學者架構為決定婚姻整體評估的前置因素，像是前述的張思嘉（2009）與Chang等人（2011）的研究，以及周玉慧與共同研究者一系列探討夫妻衝突與因應策略對婚姻整體評估之影響的研究（周玉慧，2011；周玉慧、謝雨生，2009）都是採用這一類的觀點。相對地，婚姻整體評估則是較常被學者設定為影響個體適應發展與生活品質的前置因素（吳明燁、伊慶春，2003），被用來探討婚姻關係如何影響個體其他的生活範疇，或個人整體的身心適應。像是Pedro等人（2012）的研究指出婚姻整體評估具有外溢的效果，能夠作用於個體的親職效能感與表現，而Beach等人（2003）的研究發現夫妻自覺較低的婚姻整體評估會影響兩年後出現憂鬱反應的程度。由於本研究關注的是個體對婚姻生活的整體經驗會如何形塑自我概念，因此同樣選擇以婚姻整體評估作為新婚夫妻婚姻生活品質的測量指標，檢證婚姻關係中雙方知覺到的婚姻整體評估是否會影響其對於婚姻我與家族我自我概念的認同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在回顧既有文獻時也注意到目前廣泛被使用來測量婚姻整體評估的量表，像是堪薩斯婚姻滿意度量表（Kansas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KMS）（Schumm et al., 1983）與婚姻品質指標（Quality of Marriage Index, QMI）（Norton, 1983）都是請參與者針對正向情緒經驗的描述句，評估自己與伴侶間婚姻關係的正向品質／滿意度（例如：我與伴侶的關係令我感到快樂、我擁有一個美滿的婚姻……等），較少有工具會同時測量參與者對於婚姻關係經驗到的整體正向與負向的情緒感受。

雖然可以想見，正向與負向的情緒經驗感受應具有負向的關聯性，尤其是當個體對於婚姻抱持著較為極端的整體評估時；但是，也不難想像即便都是在婚姻關係中經驗到極端高度正向情緒感受的個體之間，彼此在婚姻關係中經驗到的負向情緒感受程度仍有可能存在著個別差異，反之亦然。更不用說那些介於極端之間、為數更多的個體，他們在婚姻生活中不會只有經歷到正向或負向的情緒感受，因此對於婚姻關係與伴侶很可能會同時抱持著正向與負向的主觀整體評價。或許，這種正向與負向情感並存的狀態才是婚姻生活普遍常見的樣態，像是Fincham等人（1997）就提出一個「雙向度的婚姻品質理論」，以此來描述婚姻關係中夫妻對於婚姻生活中的不同的面向，可能同時包含正向與負向評價的現象。後續的研究也支持正向及負向婚姻品質是兩個中度負相關但獨立的向度，並與配偶在婚姻中的歸因與互動表現產生不同的關聯（Fincham et al., 1997; Rogge et al., 2017）。

不僅正向與負向的婚姻品質可以並存於婚姻生活中，兩種婚姻品質對個體如何形塑自我概念也有著不同的運作機制。根據探討正、負向經驗與自我概念的相關研究，部分學者指出個體會出於維護正向自我概念的強烈動機，而對生活中與自我相關的正向經驗（訊息或回饋）有著較多的偏好與認知處理（e.g., Baumeister & Cairns, 1992; Sedikides & Green, 2000），然而另一部分的學者則主張負向經驗（訊息與回饋）在演化上具有提醒個體應注意自身生存適應表現的功能，個體會因此而精緻處理與自我相關的負向經驗（較多注意與較高的回憶表現）（e.g., 黃博聖等人，2017；Baumeister et al., 2001）。換言之，正、負向經驗對個體的生活都有其適應性的價值，兩者有著並行不悖的處理歷程，因此負向經驗不會只是單純地消除（undo）正向經驗對個體生活適應帶來的影響。這些觀點凸顯出，相對於只將負向經驗視為正向經驗之相反面的作法（即透過反向計分併入正向題分數），本研究特別針對婚姻中的正向與負向經驗進行實徵研究，在婚姻關係與自我概念相關領域的學術與應用皆具有別於過往的貢獻與價值。

回顧既有文獻，由張思嘉等人（2008）發展編製的量表是少數將婚姻中正向與負向經驗感受分開來進行整體評估的測量工具（請參考附錄一），其測量題項的內容較著重於個體在婚姻生活中經驗到的情緒感受：正向婚姻品質是以溫馨與快樂、愛與關懷、充實、有趣等正向情緒感受進行測量；而負向婚姻品質則是以後悔、緊張、沉悶枯燥、寂寞等負向情緒感受進行測量。雖然該量表已經運用在一些探討婚姻關係的實徵研究中，但是這些研究多是將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視為婚姻關係潛在變項的兩個測量指標，概念上相當於是將負向品質分量表的分數轉向計分後與正向品質分量表分數

加總 (e.g., 周玉慧、謝雨生, 2009; 張思嘉等人, 2008; Chang et al., 2011), 或是將兩者分開當作不同的效標變項 (例如: 周玉慧, 2011), 至於以負向婚姻品質獨立出來做為一項預測變項的實徵資料則是付之闕如。

綜上所述, 當實徵研究僅以正向情緒經驗的描述句測量正向婚姻品質, 或是透過反向計分將負向婚姻品質的描述句轉換成正向婚姻品質的指標時, 便可能窄化、忽略了「負向婚姻品質」在婚姻生活中所產生的重要作用, 而分開探討婚姻中正向與負向的情緒經驗感受, 在學術討論與實務應用上應當都具有相當的價值。因此, 本研究將分別驗證婚姻生活中經驗到正向與負向情緒感受的整體評估, 會如何影響新婚夫妻的內在系統中對於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認同程度。

三、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

婚姻關係是由伴侶雙方共同構築並經營, 透過情感與行動的互動交流而建立, 而伴侶看待關係中自我的方式也同樣會受到彼此的雙向影響。參考家庭發展雙互動歷程 (dual dynamic of family development) (Elder, 1984) 的觀點, 本研究認為伴侶各自的心理狀態與個人發展不僅會決定自己在關係中的行為表現, 而這些行為表現也會作為伴侶各自調整內在心理狀態與個人發展的依據。尤其華人文化又特別重視人際連結, 關係更是個體在與他人互動時的重要脈絡 (例如: 黃光國, 2009; 楊中芳, 2001), 個體會敏感於關係品質的變化並且隨之作出調整, 改變自己對於自我的看法。這樣的觀點也符合社會學家 Charles Horton Cooley (1902) 提出的鏡中自我 (looking-glass self) 現象, 指出個體對於自我的想法會大幅地受到互動對方的影響。以異性戀婚姻為例, 妻子對於婚姻關係感到滿意的正向情緒經驗, 可能會透過互動時積極正向的言行表現, 一點一滴逐漸形塑出丈夫的自我概念, 認為自己在婚姻關係中是個稱職的丈夫, 或是在家族裡是個稱職的團隊成員。而妻子對於婚姻關係感到不滿意的負向情緒經驗, 也同樣會藉由表現出負向的互動行為, 積累地影響著丈夫採取自己是個不適任的丈夫或家庭成員的信念看待自己。同樣地, 丈夫對婚姻生活的正向與負向情緒經驗也會循著上述的機制對妻子的自我概念造成影響。

簡言之, 婚姻伴侶如何相互影響? 伴侶經驗到的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會不會影響個體自我概念? 而丈夫與妻子是否會有不同的作用形態? 本研究相信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探討均有實務應用的價值, 因此除了驗證個體自我概念 (婚姻我與家族我) 是否受到自身主觀知覺之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的影響之外, 也將延伸探討個體自我概念是否會受到伴侶知覺之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影響的可能性。

目前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建議以對偶資料 (dyad data) 進行伴侶關係的研究 (例如：陳富美、利翠珊，2004；蕭英玲、黃芳銘，2010)，強調伴侶關係有著相互緊密牽連的特徵，若只收集單方面的資料將有可能因為訊息不完整而產生偏差。其中又以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 (Kenny & Ledermann, 2010) 受到廣泛學者的關注，經常被用來探討親密伴侶間相互影響的互動歷程 (例如：陸洛、張好玥，2015；蕭綱玉等人，2018)。這個模式的優勢是能夠在考慮到伴侶資料具相依性特徵的前提下，利用單一模型同步驗證關係中兩個個體自身預測變項對自身效標變項的行動者效果 (actor effect)，並且探討自身預測變項對伴侶效標變項的伴侶效果 (partner effect)。由上述介紹可知，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非常適合本研究用來探討伴侶間相互影響的雙向歷程，一方面可驗證個體自覺在婚姻生活的正向、負向經驗感受對於形塑自身自我概念的行動者效果 (丈夫→丈夫；妻子→妻子)，另一方面也可探討個體對婚姻生活的正向、負向經驗感受是否也會作用於伴侶之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 (丈夫→妻子；妻子→丈夫)。因此本研究將採取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檢驗新婚階段夫妻經驗到的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對雙方在步入婚姻後婚姻我與家族我之形塑的行動者效果與伴侶效果。

四、研究目的與假設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婚階段夫妻對於婚姻生活經驗的觀感會如何影響兩年後的婚姻我與家族我，並且較細緻地將個體對婚姻生活經驗的正向評價 (滿意度) 與負向評價 (不滿意度) 各別進行分析，藉此探討經驗感受的價性 (valence) 可能具有不同的影響。除此之外，更採用前述的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探討丈夫與妻子的行動者效果，以及雙方間相互影響的伴侶效果。

根據前述的文獻討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兩個部分的各項假設。第一個部分針對正向婚姻品質提出相關假設，個體自身經驗到的正向婚姻品質會對其自身的婚姻我 (假設1-1A) 與家族我 (假設1-1B) 的認同程度有正向的行動者效果，而自身經驗到的正向婚姻品質同樣會對其伴侶的婚姻我 (假設1-2A) 與家族我 (假設1-2B) 的認同程度有正向的伴侶效果。第二個部分則是針對負向婚姻品質提出相關假設，個體自身經驗到的負向婚姻品質會對其自身的婚姻我 (假設2-1A) 與家族我 (假設2-1B) 的認同程度有負向的行動者效果，而自身經驗到的負向婚姻品質同樣會對其伴侶的婚姻我 (假設2-2A) 與家族我 (假設2-2B) 的認同程度有負向的伴侶效果。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與施測程序

為了增加資料的異質性，研究者邀請十位志願參與並熟悉本研究目的的研究生，協助在臺灣各地招募結婚三年內的夫妻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共進行了兩波調查，首波調查招募居住在台灣北、中、南、東等地區的新婚夫妻共計109對，施測時間自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每對夫妻參與者都是分開接受面訪，由受過訓練的訪員請參與者依據問卷題目進行填答，問卷題目包含本研究所關心的婚姻經驗量表（含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所有參與者在完成面訪後，訪員均會詢問是否有意願留下聯絡方式，以便繼續參與大約兩年後的第二波追蹤調查。

第二波調查則是由研究者將問卷寄給有意願持續參與調查研究的夫妻參與者，施測時間自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約歷時一年，問卷內容包含本研究關心的自我概念量表。最後得到完整參與兩波調查的資料共計有93對（佔原資料約85%），其在首波資料中平均婚齡為1.30年（標準差為0.68年），婚齡分布情況未滿一年與一年以上未滿兩年的資料各佔40%，剩下的20%資料則是兩年以上未滿三年。丈夫與妻子的平均年齡分別為31.46歲（標準差為3.51歲）與29.89歲（標準差為2.84歲），教育程度多為大學（丈夫為52%；妻子為59%），其他更詳細的樣本特徵請參考表1。此外，在比較僅參與第一波調查的資料和兩波調查均參與完成的資料後，只發現前者妻子經驗到的負向婚姻品質顯著地高於後者（ t -value = -2.49, p = .024），其餘變項分數比較的差異程度均未達顯著水準。

二、測量工具

（一）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

本研究使用張思嘉等人（2008）發展的婚姻經驗量表，該量表的編製參考了伊慶春（1991）與李良哲（1999）等人所使用的婚姻滿意度量表題項，以及張思嘉（2001）對已婚夫妻進行訪談得到的結果，共有14個題項（完整題項請參考附錄一）。為聚焦探討新婚夫妻對婚姻狀態或伴侶經驗到的正向與負向情緒感受，將原量表中涉及婚姻穩定（我和她／他的關係十分穩定）與離婚意願（我和她／他可能會分居或離婚）等未直接測量情緒經驗感受的題項刪除，保留剩下的6題用來評估華人夫妻在婚姻關係中所經驗到愛與關懷、充實愉悅，以及相互信任的正向婚姻品質；以及另外6題用來測得華人夫妻在婚姻關係中經驗到懊悔埋怨、沈悶寂寞，以及充滿壓力

表1
有效樣本的人口學背景資料

	平均數	標準差	次數	百分比
首波調查蒐集的資料				
夫妻婚齡（年）	1.30	0.67		
丈夫年齡（歲）	31.46	3.51		
妻子年齡（歲）	29.89	2.84		
家庭月收入（新台幣）				
30,000以下			4	4%
30,001至60,000			28	30%
60,001至90,000			41	44%
90,001至120,000			15	16%
120,001以上			5	5%
居住地區				
北部			53	57%
中部			11	12%
南部			20	22%
東部			9	10%
丈夫教育程度				
高中職或以下			6	6%
五專			8	9%
大學			48	52%
研究所			31	33%
妻子教育程度				
高中職或以下			3	3%
五專			9	10%
大學			55	59%
研究所			26	28%
第二波調查蒐集的資料				
子女數				
無			31	33%
1位			49	53%
2位			13	14%

註：N=93。居住地區：北部包括雙北、基隆、桃園、新竹；中部包括苗栗、台中、彰化、雲林、南投；南部包括嘉義、台南、高雄、屏東；東部包括宜蘭、花蓮、台東。

的負向婚姻品質。參與者以Likert四點量尺評估各題項描述符合自身婚姻經驗的程度，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序計為1至4分。既有的實徵研究指出這兩個量表均有可接受的信、效度表現，因素分析的結果亦支持兩個因素的結構（周玉慧，2011；張思嘉等人，2008）。而本研究在移除前述題項後，丈夫資料中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分量表仍具有可接受的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 .83與 .78，在妻子部分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 .84與 .71。

（二）婚姻我與家族我

使用Chang等人（2011）依據楊國樞（2004）提出華人自我理論的觀點所發展的測量工具，適用於測量華人的個體我、關係我、團體我，以及他人我等自我概念，本研究僅採用對應於關係我、團體我自我概念的婚姻我及家族我分量表。兩個分量表各有7個題項，婚姻我分量表用來評估參與者在婚姻關係中與配偶之間相互尊重、彼此分享，並且維護和諧互動的關係自我概念（例如：我對與配偶之間的關係有很強的認同感、我能設身處地的替配偶著想），而家族我分量表則是用來評估參與者在家人團體中愛護家人、達成家人共識，並且實現家庭目標的團體自我概念（例如：我重視家人的意見、我會努力達成家人的期待）。以Likert四點量尺進行作答，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序計為1至4分。在Chang等人（2011）過去的實徵資料分析中，這兩個分量表均有可接受的信、效度表現，而本研究以丈夫資料求得的婚姻我與家族我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 .81與 .85，而就妻子資料中兩個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 .77與 .79。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先使用SPSS軟體分析各主要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兩兩相關係數，並且以相依樣本t檢定比較丈夫與妻子的各變項得分，接著為了驗證各項假設，本研究以Mplus軟體採取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SEM），並且有四項處置。首先，由於夫妻之間經驗到的正向、負向婚姻品質均具有中度的負相關，若置於同一個分析模型會令部分變項之間的路徑效果受到排擠，而失去了本研究想要分開探討婚姻生活中正向與負向情緒經驗感受之影響的目的，因此我們將進行兩個不同的分析模型，一是以丈夫與妻子的正向婚姻品質作為預測變項、另一則是以雙方的負向婚姻品質作為預測變項，探討這兩組變項對其自身與伴侶婚姻我、家族我的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型。其次，為了簡化模型的複雜度，本研究參考Little等人（2002）的建議，將每個變項進行項目與

構念間平衡的合併策略 (item-to-construct balance parceling strategy)，遵循著讓彼此之間的因素負荷量盡量接近的原則，各自合併成三個合併指標 (indicator)。第三，分析時本研究將參與夫妻的年齡、教育程度、婚齡、家庭平均月收入，以及子女數納入分析模型做為控制變項。最後，本研究採用多種指標評估假設模型與研究資料之間的適配度，並參考學者的建議，以卡方自由度比值 (χ^2/df) 應小於3 (Kline, 2016)；CFI、TLI等係數應大於 .90 (Bentler, 1990; Bentler & Bonett, 1980)；RMSEA係數與SRMR係數小於 .060屬理想、小於 .080為模型可接受的標準 (Hu & Bentler, 1999; McDonald & Ho, 2002)。

參、研究結果

表2摘要了各主要變項的平均值、標準差，以及兩兩相關係數，本研究並且進行夫妻間平均數的相依 t 檢定，結果顯示所有主要變項平均數在夫妻間的差異都未達顯著水準。相關係數的結果顯示，不論是丈夫或是妻子的資料，正向婚姻品質與負向婚姻品質之間都具有中度顯著的負相關，與婚姻我及家族我也都有顯著的正相關，而兩種自我概念之間也有顯著的正相關。夫妻之間不同的是，妻子的負向婚姻品質與其自身的兩種自我概念之間有負向且顯著的相關係數，但是在丈夫的資料裡這兩個相關係數皆未達顯著水準。而各變項在夫妻之間的相關係數顯示，丈夫與妻子彼此的正向婚姻品質、婚姻我，以及家族我均有顯著的正相關，顯示夫妻之間在這些面向的評估、感受有一定的共變程度，至於負向婚姻品質則未有達顯著水準的相關程度。至於夫妻其中一方的正向婚姻品質與負向婚姻品質和另一方的自我概念 (婚姻我、家族我) 之間的相關程度，則會隨著「丈夫—妻子」或是「妻子—丈夫」而有所不同。

圖1呈現了夫妻正向婚姻品質對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型，該模型具有可接受的整體適配度表現 ($\chi^2 = 264.16; df = 204; p = .003; \chi^2/df = 1.29; CFI = .93; TLI = .91; RMSEA = .056; SRMR = .052$)，且所有觀察指標與潛在變項之間的負荷量均達顯著水準 ($ps < .001$)。分析結果顯示丈夫與妻子的正向婚姻品質對自身的婚姻我的行動者效果 (依序： $\gamma_{11} = .50, SE = 0.11, p < .001$ ； $\gamma_{32} = .55, SE = 0.12, p < .001$) 以及對家族我的行動者效果均達顯著水準 (依序： $\gamma_{21} = .33, SE = 0.12, p = .007$ ； $\gamma_{42} = .27, SE = 0.13, p = .034$)。伴侶效果僅有妻子正向婚姻品質對丈夫婚姻我的路徑效果達顯著水準 ($\gamma_{12} = .24, SE = 0.12, p = .036$)，丈夫對妻子的伴侶效果則未達顯著的水準。

圖2則是摘要了夫妻負向婚姻品質對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型，該模型同樣具有可接受的整體適配度表現（ $\chi^2 = 253.49$; $df = 204$; $p = .011$; $\chi^2/df = 1.24$; $CFI = .93$; $TLI = .91$; $RMSEA = .051$; $SRMR = .059$ ），所有觀察指標與潛在變項之間的負荷量也都為顯著（ $ps < .001$ ）。分析結果指出丈夫的負向婚姻品質對其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行動者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對妻子兩種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也都沒有達到顯著水準。相對地，妻子的負向婚姻品質對其自身的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行動者效果均達顯著水準（依序： $\gamma_{32} = -.53$, $SE = 0.14$, $p < .001$ ； $\gamma_{42} = -.42$, $SE = 0.14$, $p = .003$ ），並且對丈夫兩種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也都有達到顯著的水準（依序： $\gamma_{12} = -.48$, $SE = 0.15$, $p = .001$ ； $\gamma_{22} = -.35$, $SE = 0.15$, $p = .025$ ）。

表2

主要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相關係數

	平均 值	標準 差	相關係數						
			1	2	3	4	5	6	7
丈夫資料									
1. 正向婚姻品質	3.61	0.39							
2. 負向婚姻品質	1.44	0.44	-.55***						
3. 婚姻我自我概念	3.26	0.41	.52***	-.16					
4. 家族我自我概念	3.27	0.43	.35***	-.13	.66**				
妻子資料									
5. 正向婚姻品質	3.54	0.45	.30**	-.20	.32**	.21*			
6. 負向婚姻品質	1.34	0.37	-.32**	.18	-.28**	-.20	-.69***		
7. 婚姻我自我概念	3.22	0.36	.18	-.19	.38***	.21*	.46***	-.35**	
8. 家族我自我概念	3.28	0.38	.19	-.24*	.27**	.25*	.30**	-.33**	.59***

註1：* $p < .05$ ；** $p < .01$ ；*** $p < .001$ 。

註2： $N = 93$ 。

圖1 夫妻正向婚姻品質對婚姻我與家族我自我概念的行動者伴侶相依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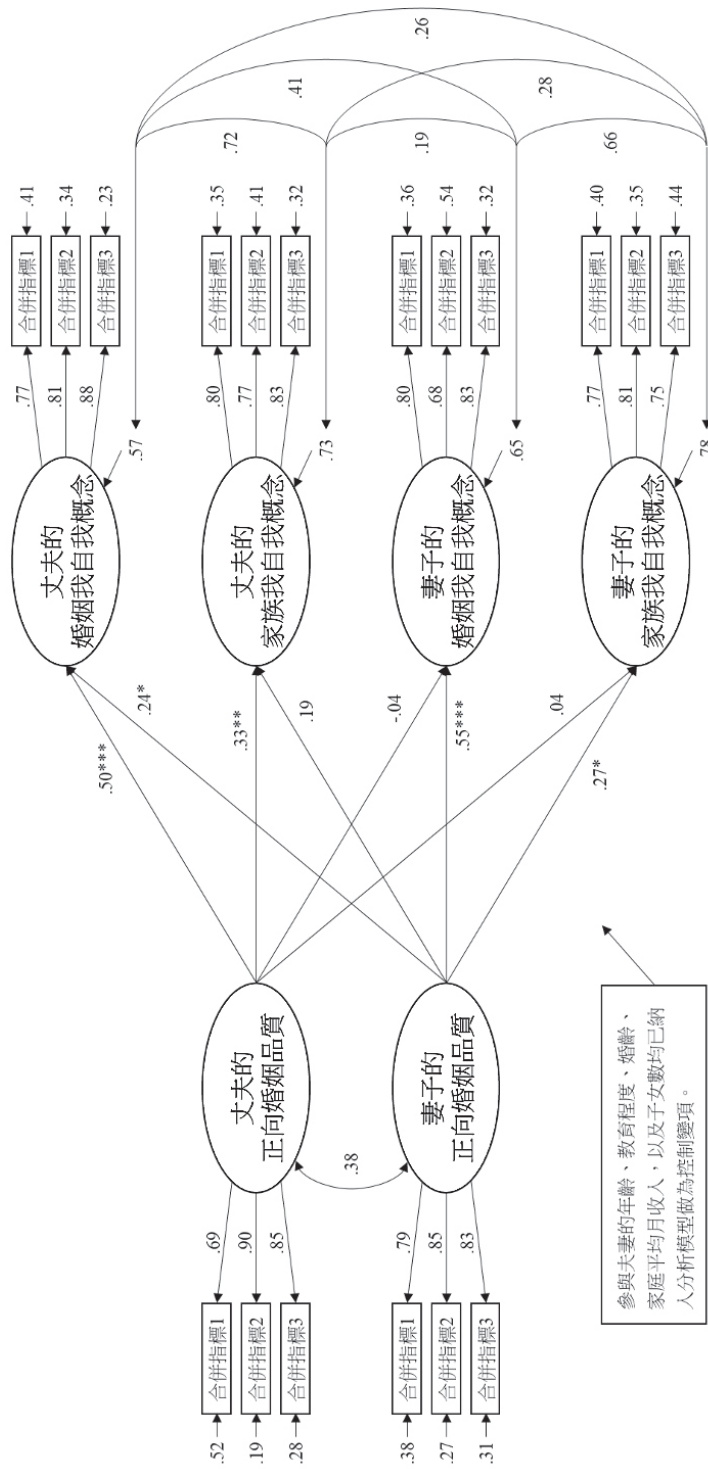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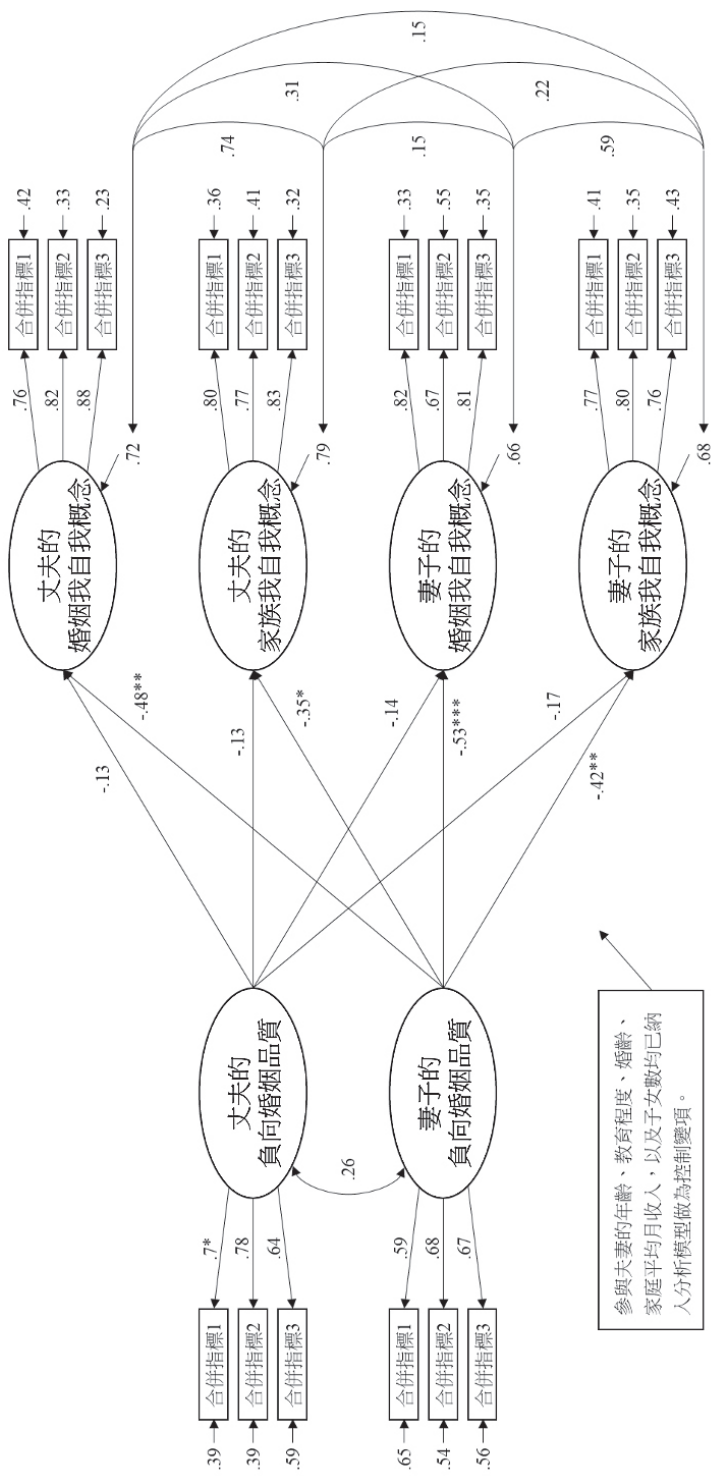


圖2 夫妻負向婚姻品質對婚姻我與家族自我概念的行動者伴侶相依模型



肆、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正向婚姻品質與負向婚姻品質對於新婚夫妻形塑、再構多元自我概念（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行動者效果與伴侶效果。首先，針對正向婚姻品質對新婚夫妻自身婚姻我與家族我自我概念的行動者效果假設，結果在丈夫與妻子資料均獲得支持。至於正向婚姻品質伴侶效果的假設，只有妻子正向婚姻品質影響丈夫婚姻我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假設獲得支持，影響丈夫家族我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假設未獲支持，而丈夫正向婚姻品質對妻子婚姻我與家族我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假設均未獲得支持。

其次，負向婚姻品質作用於自身婚姻我與家族我自我概念的行動者效果假設，只有妻子資料獲得支持，丈夫資料未獲得支持。至於負向婚姻品質影響伴侶婚姻我與家族我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假設，同樣只有妻子資料獲得支持，丈夫資料同樣沒有獲得支持。底下依據行動者效果與伴侶效果兩個部分針對各項結果與既有文獻之間的關聯性進行討論，接著探討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並提出可供實務應用參考的建議。

一、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對兩種自我概念的行動者效果

本研究分析結果指出，丈夫與妻子雙方自覺的正向婚姻品質都能正向作用於兩年後自身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自我概念。這樣的結果符合社會認知取向性格理論的觀點，強調內在性格系統不僅會決定個體的生活經驗，生活經驗也會反過來重塑、建構個體的內在性格系統（Bandura, 1986; Mischel & Shoda, 1995）。並且，也呼應一些探討正向經驗與自我概念之間關聯性的研究發現，指出個體會因為有強烈的動機來維護正向的自我概念，因此往往會對生活中與自我相關的正向經驗有較多的偏好與認知處理（e.g., Baumeister & Cairns, 1992; Sedikides & Green, 2000）。

伴侶雙方在結婚以後，若能在婚姻生活中經驗到較多的愛與關懷、充實愉快，以及互信互助等正向經驗感受，一方面將會令個人更加認同自己在婚姻關係中身為伴侶重要他人的婚姻我自我概念，內化「伴侶」的社會角色身分，並且與伴侶相依扶持、同甘共苦，重視並且維繫彼此關係的親密連結。另一方面，正向婚姻生活經驗也會作用於個體對家族我自我概念的認同程度，這符合家庭系統理論中外溢效果的觀點（e.g., Cox et al., 2001; Pedro et al., 2012），良好的婚姻次系統會進而影響伴侶雙方的其他家庭次系統，整體來說，會讓個體更加認同因婚姻關係而擴大、增加的家族成員角色，內化自己身為家族團體一員的自我概念，更加考量到整個家族的團體福祉，並強化、實現整個家族的團結與歸屬感。

本研究也發現，對婚姻生活經歷到負向的情緒感受會對其婚姻我與家族我的形塑或再構具有負面影響，這呼應過去研究指出個體會特別關注與自我相關的負向訊息或回饋（e.g., 黃博聖等人，2017；Baumeister et al., 2001），對於這類負向經驗會有較多的注意與認知處理；可是，在本研究中這個現象卻只有在妻子這一方獲得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進行一項額外的模型分析，只針對「丈夫—丈夫」與「妻子—妻子」各自的行動者效果而不考慮「丈夫—妻子」與「妻子—丈夫」彼此影響的伴侶效果，結果同樣指出負向婚姻品質對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負向行動者效果只有在妻子達顯著（依序： $\gamma_{31} = -.39, SE = 0.15, p = .012$ ； $\gamma_{41} = -.36, SE = 0.15, p = .015$ ），在丈夫卻仍舊是未達顯著的水準，顯示丈夫行動者效果並非是因為受到妻子伴侶效果的排擠影響而在正式模型分析中未達顯著水準；另一方面，從表2的零階相關結果也指出丈夫的負向婚姻品質與其婚姻我與家族我都沒有達顯著的相關。這些結果都指出丈夫的負向婚姻品質與其自身的婚姻我、家族我沒有明顯的關聯性。

針對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兩項可能的解釋。首先，這可能反映出在華人文化中男性在婚姻關係中較能忍讓，壓抑自己情緒的作法。部分的丈夫認為這種能承受婚姻中艱辛勞苦的表現反而強化了自己在婚姻中是一個「男子漢」的性別角色形象，恰好符合婚姻關係中家人關係及家族的福祉優先於個人感受的表現，因此調和了負面的影響。回顧既有研究，利翠珊（2012）探討華人夫妻的忍與婚姻滿意度的關聯性，發現丈夫不僅在容忍、忍耐，以及忍讓等各類忍的表現都高於妻子，而且指出忍耐（如壓抑、克制自己想法）、忍讓（如犧牲、順應、逃避衝突）兩者雖然都是壓抑個人期待的行為傾向，但是對丈夫來說並不一定會對關係滿意度產生負面的影響效果。

其次，上述研究結果也可能反映了男性與女性對於婚姻生活經驗著重的內涵有所不同，以致彼此在新婚階段自我概念受到負向情緒經驗形塑與再構的歷程也會有所差異。劉蓉果與朱瑞玲（2016）的研究便指出，丈夫在家庭中的角色責任與義務是台灣男性婚姻效能的重要來源，女性的婚姻效能則主要受到家人情感互動因素的影響。換言之，即便男性在婚姻生活中經驗到負向的情緒感受，只要這些感受並未損及個人身為丈夫角色的家庭責任與義務，負向情緒感受並不會對個人婚姻與家族自我概念的形塑與再構造成影響；相對地，婚姻生活中的負向情緒經驗感受則因女性對於家人情感互動的經驗較重視，而對妻子的婚姻與家族自我產生顯著的行動者效果。期望未來研究持續探討個體對於傳統性別角色框架的認同程度造成的可能影響，或是更深入比較不同性別重視婚姻生活中情緒經驗感受的程度差異，方能對這項預期外的發現進行具體的實徵驗證。

二、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對兩種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

本研究的模型分析結果也支持伴侶知覺到的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具有作用於自身婚姻我與家族我的伴侶效果，只是這些伴侶效果只有反應在妻子的婚姻品質對丈夫自我概念的路徑方向上。對於這項夫妻之間不對稱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嘗試從人際雙向互動的「訊息發送者」的角色進行解釋（Gamble & Gamble, 2014）。有可能是因為丈夫較不擅於清楚地傳遞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經驗到的正向情緒感受，並且傾向壓抑、隱藏自己對婚姻生活經驗到的負向情緒感受，使得妻子較難以察覺丈夫對於婚姻生活的經驗感受，所以也就不會影響其自我概念的形塑歷程。依循這樣的觀點，研究結果指出妻子經驗到的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會影響丈夫的婚姻我與家族我，應該是因為妻子比較常外顯地表現出自己在婚姻生活中所經驗到的正、負向情緒，使得丈夫可以正確地理解自己的需求與感受，所以丈夫自我概念的形塑歷程會明顯地受到妻子的正向與負向情緒經驗感受的影響。

而回顧既有文獻，我們確實發現男性比較會採取壓抑（suppression）的策略來調控自身的情緒經驗，像是Underwood等人（1992）的研究指出，父母在教養子女的情緒表達時會依據子女的性別而有不同的指示，相較於女兒，會對兒子的情緒表達有較多的要求與約束，這會使得男性更容易習得以壓抑的方式管理自身的情緒經驗。Gross與John（2003）以美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而Yeh等人（2017）的研究則是以台灣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經由自評式的測量工具進行調查，研究的結果都指出男性普遍比女性更常採取壓抑的情緒調控策略。另外，既有研究也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善於表現（expression）出自身的正、負向情緒經驗。像是LaFrance等人（2003）的後設分析研究指出女性較男性有更多的正向且具社交功能的情緒表達。而Chaplin與Aldo（2013）的後設分析結果同樣指出，從幼兒到青少年階段女性都有比男性更多的正、負向情緒表達。江文慈（2018）以台灣的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也一致地發現女性在親密或普通、私下或公開等情境中的正向情緒表達都較男性來得多，至於負向情緒的表達雖然又會受到情緒種類的影響，但是大抵上仍舊是常見於女性。這些研究發現都指出丈夫可能是因為較不會將自己對婚姻生活的正、負向經驗感受表現出來（或是較傾向於壓抑隱藏這些經驗感受），所以作用於妻子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未達顯著水準。反之，妻子則是因為較會表現出自身對婚姻生活的正、負向經驗感受，因此會有明顯的伴侶效果作用在丈夫自我概念的形塑歷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妻子正向婚姻品質只有對丈夫婚姻我具有正向且顯著的伴侶效果，對丈夫家族我的伴侶效果卻未達到顯著的水準。然而從零階相關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妻子的正向婚姻品質與丈夫在兩年後的家族我是具有顯著且正向的相關程度的，所以有可能是因為樣本數較小的緣故而使得這項正向外溢的伴侶效果並不明顯，尤其當模型的分析結果也顯示丈夫與妻子之間的正向婚姻品質具有中度相依關聯性、丈夫婚姻我與家族我的殘差項之間同樣具有高度相關的時候，會更加難以判斷妻子正向婚姻品質對丈夫家族我的伴侶效果是否具有顯著的作用。未來需要後續學者蒐集更大量的研究資料進行實徵驗證，重新檢視妻子正向婚姻品質對丈夫家族我是否會產生伴侶效果的影響歷程。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接著針對本研究的五項限制進行討論，並且提出可供未來研究參考的建議方向。首先，本研究各主要變項都使用自評式量表進行測量，所以得到的行動者效果可能有因為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而被膨脹的疑慮。然而，在本研究中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的測量時間點，和婚姻我的測量時間點之間已經間隔了約兩年的時間，這樣的設計已經符合Podsakoff等人（2003）提出時序間隔法（temporal separation procedure）的建議，透過較長時間的間隔來降低共同方法變異偏誤的影響。而本研究仍會建議後續研究在採用自評式量表進行調查時，可以採用跨時間的設計，這樣才能有效地避免研究結果受到共同方法變異偏誤的影響。甚至，若能更進一步地在第一個測量時間點蒐集效標變項的資料，在第二個測量時間點蒐集到預測變項的資料，並且透過更大量的研究樣本以求得較穩定的分析結果，就可以結合自我迴歸模式（autoregressive model）和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更加確立婚姻生活品質與兩項自我概念之間作用歷程的方向性，或是發現彼此有著相互影響的雙向作用歷程。

不過本研究也因為採取間隔兩年時間進行兩波調查的設計，所以出現了樣本流失的現象，這是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限制。而且經由分析還發現流失的樣本與持續參與的樣本之間在妻子負向婚姻品質的量表分數上有顯著的差異，流失樣本中妻子的負向婚姻品質明顯地高於持續參與樣本。這種抽樣偏誤的現象是因為參與者持續參與第二波調查的意願會受到自身婚姻狀況的影響，在第一波調查時就已經對婚姻經驗到較多負向情緒感受的參與者便因此拒絕參與第二波的追蹤調查。由於流失了部分資料而使得資料的變異程度受到窄化，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各項與妻子負向情緒感受有關的假設都有獲得統計分析結果的支持，顯示這項抽樣偏誤的影響應該不大。此外，

由於本研究的樣本量較小（以夫妻雙方的資料作為單位，本研究僅有93組夫妻的資料），即便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得到模型與資料之間的整體適配度表現均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但是在解釋本研究結果時仍須特別小心，期望後續研究可以透過更大的樣本量進行分析，以重覆驗證本研究的發現。

第三，本研究參考楊國樞（2004）提出的社會取向自我概念，認為個體在婚姻關係締結後看待自我的方式會有別過往：一方面是形塑婚姻我的自我概念，開始更加認定自己身為伴侶重要關係他人的身分角色；另一方面則是重新調整家族我的自我概念，必須開始將自身所屬的家族團體擴張，將伴侶的親屬家人也一併囊括在內。不過，這個包含自己與伴侶家庭成員的家族我畢竟是由研究者所認定的概念，實際上參與者在填答評估家族我的測量題目時，心中所設想的家族成員到底包含了哪些成員？若是依據華人社會的父系家庭結構，確實有可能丈夫與妻子所想到的家族我在內涵上有所差異，其中丈夫可能仍是以自家的家族成員為核心，甚至不太會想到妻子的家族成員，但是妻子卻很有可能設想到丈夫的家族成員。如果參與者彼此之間對家族成員的想像有所不同，那麼這是否又會使本研究的結果產生偏誤？這些種種的問題仍有待後續研究採取更嚴謹、明確的測量方式，針對本研究的發現進行重複驗證來加以確認。

第四，本研究兩波資料的蒐集時間距今已相距十年，研究的結果可能會受到世代因素（cohort effect）而對外推效度產生影響。婚姻的樣貌在台灣正逐漸轉變，張思嘉等人（2018）的研究指出，受到近年來性別平權思潮的影響，傳統婚姻中對應「男主外、女主內」性別角色框架的夫妻義務正逐漸發生改變，朝向不分丈夫與妻子，對外雙方都需進入職場，肩負起賺取家庭生計的經濟責任，而對內也都應當分擔家中勞務，並且共同承擔教養下一代的親職責任。既然對婚姻生活的整體評估包含了個人對於婚姻關係或伴侶的期待與需求之間的契合與差距（Fincham et al., 2011），那麼當社會氛圍變遷，人們對於婚姻關係或伴侶的期待隨之發生轉變時，其對個體自我概念產生作用的歷程也有可能受到不同世代對婚姻關係期望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可能僅是捕捉到世代更迭中的一個片段，但對於理解華人婚姻關係演變的整體趨勢仍有其貢獻與價值，未來也期待能有後續研究可以持續探討婚姻生活經驗與華人夫妻自我概念之間的關聯性。

最後一個限制是婚姻生活形塑自我概念的運作機制，在現實生活中遠比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模型來得更加複雜。尤其是伴侶效果的運作機制：若以人際互動的歷程來看，婚姻伴侶對於婚姻生活的正、負向經驗感受，至少必須經歷「表達」的過程來將

感受傳遞給對方，而對方也必須經歷「接收」、「解讀」，以及「回應」等過程，才算是完整的人際互動歷程，而這之間的不同過程都有可能對個體形塑、調整婚姻我與家族我等自我概念產生影響。Cooley（1902）提出的鏡中自我現象也強調個體是在接收到互動他人所傳遞的訊息後，先是形成自己在互動他人心中可能的形象，接著才是以這樣的形象來理解自我、形塑出對於自我的概念。換言之，在這整個歷程中他人的訊息是如何傳遞的（或甚至根本沒有被傳遞，就像是我們針對丈夫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作用於妻子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都未達顯著水準所提出的解釋一樣）、訊息又是如何被接收、被解讀，以及被回應，這些都是在本研究探討伴侶效果時所遺失的重要環節，期盼後續的學者可以思考並嘗試驗證這些更細緻的運作歷程。但即便缺少了這些環節，本研究還是發現了顯著的伴侶效果，這足以說明了婚姻伴侶對於婚姻生活的正、負向經驗感受也是個人用來理解、形塑自我概念的重要依據，值得關心婚姻生活或自我概念等議題的學者參考，或是供助人工作者作為實務介入時的依據。

四、可供實務應用參考的建議

雖然有以上各項限制，本研究仍有一些可供助人工作者與家庭生活教育推廣者實務應用參考的發現。首先，研究結果指出個體對婚姻生活的正向經驗整體評估，也就是個體對於婚姻關係的期待與需求能夠獲得滿足的程度，將會影響其自身的婚姻我與家族我，這除了再次印證了用心經營婚姻生活這老生常談的重要性外，也突顯出夫妻能否採取正向解讀的認知框架（frame）看待婚姻生活經驗的重要性。助人工作者與家庭生活教育推廣者可以參考這項發現，試著透過輔導、教育方案的施行，讓婚姻中的個體更善於發掘、感受婚姻生活中可以帶來正向經驗感受的事物。

其次，本研究發現個體對於婚姻生活的負向經驗整體評估會降低自身對於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自我認同。即便如此，本研究並不認為一味地壓抑、否認這些負向經驗感受就能順利地避免婚姻我與家族我受到負面的影響。我們認為在任何一段婚姻關係中，或多或少都有可能因為關係或伴侶無法滿足自己的期待而產生對婚姻關係不滿意的感受。像是Geist與Gilbert（1996）便主張，親密關係中雙方會因為家庭環境與成長經歷的不同導致彼此在想法、習慣以及價值觀上有所差異，而這些差異又會在彼此交往的過程中隨著相互重疊、依賴的程度而益發明顯，無可避免地會引起雙方對關係或伴侶感到失望或不滿足的感受。既然婚姻生活中負向的經驗感受是難以避免的，那麼與其消極地壓抑或否認，本研究會建議實務工作者，在協助伴侶的過程中嘗試與雙方釐清帶來負面情緒感受的婚姻生活面向，並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以建設性地轉化

這些令人感到失望、不滿意的時刻，降低新婚夫妻對於婚姻關係經驗到的負向情緒感受。

最後，本研究指出妻子負向婚姻品質對自己與伴侶的自我概念都具有顯著負面影響的結果，雖然其中的歷程與機制仍需後續研究更加深入探討，但依據目前的發現我們會建議新婚狀態的丈夫，以及助人工作者和家庭教育推廣者多加留意新婚女性如何詮釋、理解婚姻關係中可能引發負面經驗感受的生活事件，盡可能營造可以緩減或是消解婚姻生活中對於伴侶關係或婚姻環境所經驗到的負向情緒感受，以緩解新婚期間的負向婚姻品質感受對雙方對自我角色的融入所可能帶來的衝擊。

參考文獻

- 伊慶春（1991）：台北地區婚姻調適的一些初步研究發現。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1(2)，151-173。[Yi, C. C. (1991). Some findings on marital adjustments in the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2), 151-173.]
- 伊慶春、熊瑞梅（1994）：擇偶過程之網路與婚姻關係：對介紹人、婚姻配對、和婚姻滿意度之分析。載於伊慶春（主編），臺灣社會的民眾意向：社會科學的分析（135-177頁）。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Yi, C. C., & Hsung, R. M. (1994). Mate selection networks and the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introducer. In C.C. Yi (Ed.), *The social image of Taiwan: Social science approaches* (pp.135-177). Sun Yat-Sen ISSP Book Series, Academia Sinica.]
- 江文慈（2018）：情緒表達的性別差異：跨情境的分析。教育心理學報，49（3），345-366。[Chiang, W. T. (2018).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expressions: A cross-situational analysi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9(3), 345-366. [https://doi.org/10.6251/BEP.201803_49\(3\).0001](https://doi.org/10.6251/BEP.201803_49(3).0001)]
- 利翠珊（2012）：夫妻關係間的忍與婚姻滿意度之關連。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5（3），447-475。[Li, T. S. (2012). Ren (forbearance) in couple relationship and how it is related to marital satisfaction.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5(3), 447-475. [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209_25\(3\).0005](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209_25(3).0005)]
- 吳明燁、伊慶春（2003）：婚姻其實不只是婚姻：家庭因素對於婚姻滿意度的影響。人口學刊，26，71-95。[Wu, M. Y., & Yi, C. C. (2003). A marriage is more than a marriage: The impacts of familial factors on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26, 71-95.]
- 李良哲（1999）：維繫婚姻關係重要因素的成人期差異初探。教育與心理研究，22，

- 145-160。[Li, L. J. (1999). Differences in elements for maintaining marital relationship in adulthood.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22*, 145-160.]
- 周玉慧（2011）：夫妻間衝突因應策略之類型變遷及其長期影響。中華心理學刊，**53**（2），229-253。[Jou, Y. H. (2011). Longitudinal transmission and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conflict-coping strategies styles on Taiwanese married couples' marital.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3*(2), 229-253. <https://doi.org/10.6129/CJP.2011.5302.06>]
- 周玉慧、謝雨生（2009）：夫妻間支持授受及其影響。中華心理學刊，**51**（2），215-234。[Jou, Y. H., & Hsieh, Y. S. (2011). The influence of provided and received supports among Taiwanese married couples.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1*(2), 215-234. <https://doi.org/10.6129/CJP.2009.5102.05>]
- 范嵐欣（2009）：華人夫妻關係衝突之人我關係協調諮商改變歷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Fan, L. H. (2009). *Research on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Chinese married couples' self-relation coordination in marital counseling*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翁嘉英、楊國樞、許燕（2008）：華人多元自尊的概念分析與量表建構：本土化觀點。載於楊國樞、陸洛（主編），中國人的自我：心理學的分析（585-649頁）。台大出版中心。[Wong, J. Y., Yang, K. S., & Syu, Y. (2008). Concept analysis and scal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ultiple self-esteem-indigenous view. In K. S. Yang, & L. Lu (Eds.), *Chinese self: Analysis of psychology* (pp.585-649).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高旭繁、陸洛（2006）：夫妻傳統性／現代性的契合與婚姻適應之關聯。本土心理學研究，**25**，47-100。[Kao, S. F., & Lu, L. (2006). The relationship of congruence in psychological traditionality/modernity to marital adjustment.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25*, 47-100. <https://doi.org/10.6254/2006.25.47>]
- 張思嘉（2001）：婚姻早期的適應過程：新婚夫妻之質性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16**，91-133。[Chang, S. C. (2009). A qualitative study of newlyweds' marital adjustment processes.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16*, 91-133. <https://doi.org/10.6254/2001.16.91>]
- 張思嘉（2009）：婚前關係與婚後適應：一個長期性的研究。中華心理學刊，**51**（3），319-339。[Chang, S. C. (2009). Premarital relationship and marital adjust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1*(3), 319-339. <https://doi.org/10.6129/CJP.2009.5103.03>]
- 張思嘉、周玉慧、黃宗堅（2008）：新婚夫妻的婚姻適應：概念測量與模式檢驗。中

- 華心理學刊, **50** (4), 425-446。[Chang, S. C., Jou, Y. H., & Huang, T. C. (2008). Newlyweds' marital adjustment: Scale development and model testing.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4), 425-446. <https://doi.org/10.6129/CJP.2008.5004.06>]
- 張思嘉、許詩淇、李惟新 (2018)：「新好男人」、「新好女人」？當代華人婚姻關係中的角色義務。本土心理學研究, **50**, 209-261。[Chang, S. C., Hsu, S. C., & Li, W. H. (2018). "Good New Men" and "Good New Women"? Role oblig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ital relationship.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50*, 209-261. [https://doi.org/10.6254/IPRCS.201812_\(50\).0005](https://doi.org/10.6254/IPRCS.201812_(50).0005)]
- 陳富美、利翠珊 (2004)：不同情感組型夫妻在家事分工上的差異：對偶資料的分析。應用心理研究, **24**, 95-115。[Chen, F. M., & Li, T. S. (2004). Differences on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Chinese marital affection types: Analysis of couple data.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24*, 95-115.]
- 陳靜宜 (2006)：個人背景特性、婚前關係發展與婚姻調適狀況的關係：以家庭建立期之夫妻為例。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 **8**, 45-68。[Chen, C. Y. (2006).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back ground factors and marital adjustments of couples who belong to the first stage of family life.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8*, 45-68. [https://doi.org/10.6246/JHDFS.200605_\(8\).0003](https://doi.org/10.6246/JHDFS.200605_(8).0003)]
- 陳謙仁、葉光輝 (2019)：護親護面型毆妻男性個案多元自我衝突調整理論與介入方案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55**, 59-95。[Chen, C. R., & Yeh, K. H. (2019). A case study of the multi-selves conflicts coordination theory and its intervention program to a male batterer who values the Chinese face and family.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55*, 59-95. <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19050055003>]
- 陸洛、張妤玥 (2015)：主管支持、工作對家庭增益，及情緒耗竭之關聯：夫妻之行動者－伴侶互依模式。本土心理學研究, **44**, 73-116。[Lu, L., & Chang, Y. Y. (2015). Supervisory support, work-to-family enrichment,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mong married couples.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44*, 73-116. <https://doi.org/10.6254/2015.44.73>]
- 黃光國 (2009)：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心理出版社。[Huang, K. K. (2009). *Confucian relationshipism: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 黃博聖、劉政宏、陳學志 (2017)：不同結果狀態對正、負向回饋的注意與回憶效果。教育心理學報, **48** (4), 469-486。[Huang, P. S., Liu, C. H., & Chen, H. C. (2017). The influence of outcome status on the attending and memory of positive and

- negative feedback.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8(4), 469-486. <https://doi.org/10.6251/BEP.20160315>]
- 楊中芳（2001）：有關關係與人情構念化之綜述。載於楊中芳（主編），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情感與信任（3-26頁）。遠流。[Yang, C. F. (2001).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conceptualization guanxi and renqing. In C. F. Yang (Ed.),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ffection, and trust of the chinese* (pp.3-26). Yuan Liou Publishing.]
- 楊國樞（2004）：華人自我的理論分析與實徵研究：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22，11-80。[Yang, K. S. (2004).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and individual orientation.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22, 11-80.]
- 楊國樞、劉奕蘭、張淑慧、王琳（2010）：華人雙文化自我的個體發展階段：理論建構的嘗試。中華心理學刊，52（2），113-132。[Yang, K. S., Liu, Y. L., Chang, S. H., & Wang, L. (2010).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ontogenetic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bicultural self: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2(2), 113-132. <https://doi.org/10.6129/CJP.2010.5202.01>]
- 劉蓉果、朱瑞玲（2016）：家庭效能信念的影響與來源。中華心理學刊，58（1），63-87。[Liu, R. K., & Chu, R. L. (2016). Impact and sources of family efficacy beliefs in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8(1), 63-87. <https://doi.org/10.6129/CJP.20160306>]
- 蕭英玲、黃芳銘（2010）：婚姻滿意度與憂鬱傾向：貫時性對偶分析。中華心理學刊，52（4），377-396。[Hsiao, Y. L., & Hwang, F. M. (2010).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depression: A longitudinal dyadic analysis.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2(4), 377-396. <https://doi.org/10.6129/CJP.2010.5204.05>]
- 蕭綱玉、葉光輝、吳志文（2018）：親密關係衝突中的建設性轉化歷程：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之探討。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1（1），29-67。[Chiao, K. Y., Yeh, K. H., & Wu, C. W. (2018). The constructiv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conflict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 analysis of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31(1), 29-67. [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803_31\(1\).0002](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803_31(1).0002)]
-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Prentice- Hall, Inc.
- Baumeister, R. F. (1999). Self-concept, self-esteem, and identity. In V. J. Derlega, B. A. Winstead, & W. H. Jones (Eds.), *Nelson-Hall series in psychology. Personality: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research* (pp.339-375). Nelson-Hall Publishers.
- Baumeister, R. F., Bratslavsky, E., & Finkenauer, C. (2001). 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

-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5, 323-370. <https://doi.org/10.1037/1089-2680.5.4.323>
- Baumeister, R. F., & Cairns, K. J. (1992). Repression and self-presentation: When audiences interfere with self-deceptive strateg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 851-86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2.5.851>
- Baxter, J., Hewitt, B., & Haynes, M. (2008). Life course transitions and housework: Marriage, parenthood, and time on house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0(2), 259-272.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8.00479.x>
- Beach, S. R. H., Katz, J., Kim, S., & Brody, G. H. (2003). Prospective effects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on depressive symptoms in established marriages: A dyadic model.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3), 355-371.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03020003005>
- Bentler, P. M. (1990). Comparative fit indexes in structural model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7, 238-246.
- Bentler, P. M., & Bonett, D. G. (1980). Significance tests and goodness of fit in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structur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8, 588-606.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88.3.588>
- Brewer, M. B., & Chen, Y. R. (2007). Where (Who) are collectives in collectivism? Towar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Psychological Review*, 114(1), 133-151.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14.1.133>
- Broderick, C. B. (1990). Family process theory. In J. Sprey (Ed.), *Fashioning family theory* (pp.171-206). Sage.
- Broderick, C., & Smith, J. (1979). The general systems approach to the family. In W. R. Burr, R. Hill, F. I. Nye, & I. L. Reiss (Eds.), *Contemporary theories about the family* (Vol. 2., pp.112-129). Free Press.
- Carr, D., & Springer, K. W. (2010). Advances in families and health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3), 743-761. https://doi.org/10.1007/978-1-4020-8356-3_32
- Chang, S., Kuo, S., Chiang, Y., & Hiew, C. (2011). Self and marital adjustment of newlyweds: A test of the four-component theory of Chinese self. In P. Singh, P. Bain, C. H. Leong, G. Mishra., & Y. Ohtsubo (Eds.), *Psychological, group, and cultural processes in changing societies: The progress in asian social psychology series* (Vol. 8., pp.231-246). MacMillan.
- Chaplin, T. M., & Aldao, A. (2013).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 expression in children: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9, 735-765. <https://doi.org/10.1037/>

a0030737

- Cooley, C. H. (190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Schocken Books.
- Cox, M. J., Paley, B., & Harter, K. (2001).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J. H. Grych, & F. D. Fincham (Eds.),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child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pp.249-27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527838.011>
- Elder, G. H. (1984). Families, kin, and the life course: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R. Parkes (Ed.), *Advances in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the famil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rel, O., & Burman, B. (1995). Interrelatedness of marital relation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8*(1), 108-132.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8.1.108>
- Fincham, F. D., Ajayi, C., & Beach, S. R. H. (2011). Spirituality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African American couples.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3*(4), 259-268. <https://doi.org/10.1037/a0023909>
- Fincham, F. D., Beach, S. R. H., & Kemp-Fincham, S. I. (1997). Marital quality: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R. J. Sternberg, & M. Hojjat (Eds.), *Satisfaction in close relationships* (pp.275-304). The Guilford Press.
- Fiske, S. T., & Taylor, S. E. (1991). *Social Cognition* (2nd ed.). McGraw-Hill.
- Gamble, T. K., & Gamble, M. W. (2014).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uilding connections together*. SAGE.
- Geist, R. L., & Gilbert, D. G. (1996). Correlates of expressed and felt emotion during marital conflict: Satisfaction, personality, process, and outcom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1*(1), 49-60. [https://doi.org/10.1016/0191-8869\(96\)00049-9](https://doi.org/10.1016/0191-8869(96)00049-9)
- Gross, J. J., & John, O. P. (200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2), 348-36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5.2.348>
- Hu, L.,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6*(1), 1-55. <https://doi.org/10.1080/10705519909540118>
- Kashima, E. S., & Hardie, E. A. (2000).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Relational,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self-aspects (RIC) Scal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1), 19-48. <https://doi.org/10.1111/1467-839X.00053>
- Kenny, D. A., & Ledermann, T. (2010). Detecting, measuring, and testing dyadic patterns in

-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4*(3), 359-366. <https://doi.org/10.1037/a0019651>
- Kline, R. B. (2016).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4th ed.). Guilford Press.
- Krishnakumar, A., & Buehler, C. (2000).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parenting behaviors: A meta-analytic review. *Family Relations*, *49*(1), 25-44.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29.2000.00025.x>
- LaFrance, M., Hecht, M. A., & Paluck, E. L. (2003). The contingent smile: A meta-analysis of sex differences in smil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 305-33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9.2.305>
- Little, T. D., Cunningham, W. A., Shahar, G., & Widaman, K. F. (2002). To parcel or not to parcel: Exploring the question, weighing the merit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9*(2), 151-173. https://doi.org/10.1207/S15328007SEM0902_1
- Marchand, J. F. (2004). Husbands' and wives' marital quality: The role of adult attachment orientations,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behaviors. *Attach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6*(1), 99-112. <https://doi.org/10.1080/14616730310001659575>
- McDonald, R. P., & Ho, M. R. (2002).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repor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thods*, *7*, 64-82. <https://doi.org/10.1037/1082-989X.7.1.64>
- Mischel, W., & Shoda, Y. (1995). A cognitive-affective system theory of personality: Reconceptualizing situations, dispositions, dynamics, and invariance in personality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2), 246-268.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2.2.246>
- Neff, L. A., & Broady, E. F. (2011). Stress resilience in early marriage: Can practice make per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5), 1050-1067. <https://doi.org/10.1037/a0023809>
- Norton, R. (1983). Measuring marital quality: A critical look at the dependent variabl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1), 141-151. <https://doi.org/10.2307/351302>
- Pedro, M. F., Ribeiro, T., & Shelton, K. H. (2012).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partners' parenting practic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aren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6*, 509-522. <https://doi.org/10.1037/a0029121>
-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5), 879-903.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88.5.879>

- Robles, T. F., Slatcher, R. B., Trombello, J. M., & McGinn, M. M. (2014). Marital quality and health: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0*(1), 140-187. <https://doi.org/10.1037/a0031859>
- Rogge, R. D., Fincham, F. D., Crasta, D., & Maniaci, M. R. (2017).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of relationship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Positive-Negative Relationship Quality (PN-RQ) scal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9*(8), 1028-1043. <https://doi.org/10.1037/pas0000392>
- Schumm, W. R., Nichols, C. W., Schectman, K. L., & Grigsby, C. C. (1983).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ses to the Kansas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by a sample of 84 married mothers. *Psychological Reports, 53*(2), 567-572. <https://doi.org/10.2466/pr0.1983.53.2.567>
- Sedikides, C., & Green, J. D. (2000). On the self-protective nature of inconsistency-negativity management: Using the person memory paradigm to examine self-referent mem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6), 906-92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9.6.906>
- Shek, D. T. L. (1995).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rital quality and well-being in Chinese married adults. *Sex Roles: A Journal of Research, 32*(11/12), 699-715. <https://doi.org/10.1007/BF01560185>
- Underwood, M. K., Coie, J. D., & Herbsman, C. R. (1992). Display rules for anger and aggression in school-age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63*(2), 366-380. <https://doi.org/10.2307/1131485>
- Yeh, K. H., Bedford, O., Wu, C. W., Wang, S. Y., & Yen, N. S. (2017). Suppression benefits boys in Taiwan: The relation between gender,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y, and mental healt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35.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7.00135>
- Yu, Y. (2015). The male breadwinner/female homemaker model and perceived marital stability: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w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rba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36*(1), 34-47. <https://doi.org/10.1007/s10834-014-9417-0>

收件日期：109年05月20日

一審日期：109年09月08日

二審日期：109年11月09日

通過日期：109年12月28日

附錄一 婚姻經驗量表中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分量表題項

題項內容	編號	備註
1.我會後悔當初和我的太太／先生結婚。	N_01	
2.我和她／他的關係十分穩定。	P_01	正式分析未採用
3.我的婚姻生活毫無價值。	N_02	
4.我信任我的太太／先生。	P_02	
5.我在婚姻生活中會感到拘束。	N_03	
6.婚姻帶給我很多溫馨與快樂。	P_03	
7.我的婚姻生活充滿了愛和關懷。	P_04	
8.我的婚姻生活很充實。	P_05	
9.我和她／他可能會分居或離婚。	N_04	正式分析未採用
10.我太太／先生會讓我感到緊張。	N_05	
11.我婚姻生活的氣氛很沈悶枯燥。	N_06	
12.在婚姻生活中，我感到寂寞。	N_07	
13.我婚姻生活的氣氛是自由開放的。	P_06	
14.我的婚姻生活很有趣。	P_07	

註：編號欄位的英文字首為P屬正向婚姻品質分量表題目、英文字首為N屬負向婚姻品質分量表題目。

The Effec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on Couples' Marital Self-Concept and Familial Self-Concept: An Analysis of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Chih-Wen Wu

Szu-Chia Ch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hih-Hsin University

Context and Objectives: Marriage brings many challenges, which require careful management and adjustment by both spouses. One of the noteworthy challenges is that individuals will start to view themselves in different ways. During the newlywed period, the self-concepts corresponding to the couple's new role of spouse and family group members will be developed. As a spouse in a marital relationship, Chinese couples' marital self-concept (MSC) represents their relationship-oriented self-construal to have mutual love and support with their spouses and maintain a harmonious interaction in their relationship. As a member of both the original family and in-law family, Chinese couples' familial self-concept (FSC) represents their group-oriented self-construal to honor their families, reach consensus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achieve the goals of all their family members. Even though the self-concept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couples' marital adaptation, research on how the marriage couples' self-concepts would be reconstructed is scarce. Because one's self-concept would be reconstructed by life experie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how marriage life influences Chinese couples' MSC and FSC in the early stage of marriage. Considering that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lf-involved experiences could drive dissimilar mechanism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effec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Then, based on the nature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marriage couples, this study also uses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to further explore the actor effect and partner effect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Method:** This study conducted two waves of follow-up surveys separated by a 2-year lag and collected a total of 93 valid dyad-data from couples living in the north ($n = 53$), middle ($n = 11$), south ($n = 20$), and east regions of Taiwan ($n = 9$). The average length of marriage at the first wave was 1.30 years ($SD = 0.68$ years), and the average age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were 31.46 years old ($SD = 3.51$ years) and 29.89 years old ($SD = 2.84$ years),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 Corresponding author: Szu-Chia Chang, e-mail: scchang@mail.shu.edu.tw.
doi: 10.53106/172851862022050064003

u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analyze two hypothetical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s. **Results:** The first model investigated the actor- and partner-effect of positive marital quality on couples' MSC and FSC and showed acceptable model fit ($\chi^2 = 264.16$; $df = 204$; $p = .003$; $\chi^2/df = 1.29$; CFI = .93; TLI = .91; RMSEA = .056; SRMR = .052). The actor-effects of husbands' and wives' positive marital quality was positively significant on their own MSC (husbands: $\gamma_{11} = .50$, $SE = 0.11$, $p < .001$; wives: $\gamma_{32} = .55$, $SE = 0.12$, $p < .001$) and FSC (husbands: $\gamma_{21} = .33$, $SE = 0.12$, $p = .007$; wives: $\gamma_{42} = .27$, $SE = 0.13$, $p = .034$). The partner-effect of wives' positive marital quality was positively significant on husbands' MSC ($\gamma_{12} = .24$, $SE = 0.12$, $p = .036$), and the other partner-effects were non-significant. The second model investigated the actor- and partner-effect of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and also showed acceptable model fit ($\chi^2 = 253.49$; $df = 204$; $p = .011$; $\chi^2/df = 1.24$; CFI = .93; TLI = .91; RMSEA = .051; SRMR = .059). The actor-effect and the partner-effect of husbands'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were non-significant on their own and with wives' MSC and FSC. However, the actor-effect and the partner-effect of wives'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were negatively significant on their own and with husbands' MSC (actor-effect: $\gamma_{32} = -.53$, $SE = 0.14$, $p < .001$; partner-effect: $\gamma_{12} = -.48$, $SE = 0.15$, $p = .001$) and FSC (actor-effect: $\gamma_{42} = -.42$, $SE = 0.14$, $p = .003$; partner-effect: $\gamma_{22} = -.35$, $SE = 0.15$, $p = .025$).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his study highlighted that positive and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in the early stage of marriage can shape and restructure Chinese couples' self-identification as a spouse and a family group member. Additionally, husbands' and wives' marriage life experiences can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ir own and their partners' self-concepts. Particularly, the wive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marital qualities have impressive impacts on shaping their own and their husbands' marital and familial self-concept. The limitation of sampling bias and its influences on the current results are discussed,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tailed mechanism link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to Chinese couples' self-concept is still very limited and requires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more attention. These findings might be of importance in providing professional consultants and family life educator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Chinese couples' marital and familial self-concept will be affected by their life experienc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marriage.

Keywords: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familial self-concept, marital self-concept,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positive marital quality.

